

王东京 主编

2006年卷 第4辑

中国经济观察

CHINA ECONOMIC SURVEY

中国人口政策不可轻变
股市定向发行机制亟待规范
政府改革：焦点与出路
国有银行改革与职能的新界定
中国百年图强的经验与教训
关于“反思改革”的一些问题
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
确保中国经济“软着陆”
国外老工业基地改造启示录
应当理性地看待收入分配
实现公平的政府责任及政策理性
最大的公平是发展生产力
“权力型”收入分配差距分析
新农村建设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
云南农垦模式调查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2006 年卷 第 4 辑

中国经济观察

CHINA ECONOMIC SURVEY

王东京 主编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济观察. 2006年卷. 第4辑/王东京主编.
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2006. 12
ISBN 7-5035-3596-2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经济-研究-中国
IV. F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1882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

电话: 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18 (发行部)

邮编: 100091 网址: www.dxcbs.net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2.25

字数: 189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所载文章，均为作者个人见解，不代表本社观点

责任编辑 朱晋平

封面设计 孙超英

版式设计 李 灵

责任校对 王洪霞

责任印制 宋二顺

《中国经济观察》

顾问 (按姓氏笔画排列):

王珏 江小娟 刘伟 刘海藩
李兴山 张卓元 张尧学 苏星
宋涛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

主编: 王东京

副主编: 赵振华 (常务) 韩保江

编委 (按姓氏笔画排列):

万安培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
王健 宁向东 张军 张维迎
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
郑介甫 柳欣 赵振华 洪银兴
顾海兵 黄少安 梁朋 韩保江
谢鲁江 潘云良

学术委员会 (按姓氏笔画排列):

于永臻 王君超 石霞 田应奎
刘振英 刘艳梅 李蕾 李继文
李省龙 李旭章 李鹏 张玉杰
张燕喜 陈文通 陈宇学 赵锦辉
施虹 胡希宁 徐平华 徐祥临
贾华强 曹立 曹新 董艳玲
鲍永升

编辑部主任: 孙小兰

主办: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

目 录

Contents

Hot Spots in Focus

- ##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

- 1

- 39 国有银行改革与职能的新界定 易宪容
New Definition of State-owned Bank Reform and Function

By Yi Xianrong

- 50 中国百年图强的经验与教训 王一江
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hina's Struggle and Prosperity for
a Hundred Years

By Wang Yijing

改革与发展

Reform and Development

- 69 关于“反思改革”的一些问题 周为民
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"Rethinking Reform"

By Zhou Weimin

- 85 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范恒山
Implement the System Safeguard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

By Fan Hengshan

- 95 确保中国经济“软着陆” 欧阳进
Ensure "Soft Landing" of China's Economy

By Ou Yangjin

- 100 国外老工业基地改造启示录 隋忠诚 殷立春
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Old Industrial Base Transformation

By Sui Zhongcheng Yin Lichun

公平与收入分配论坛

Forum of Fairnes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

- 109 应当理性地看待收入分配 周其仁
Ought to Rationally Treat Income Distribution

By Zhou Qiren

- 124 实现公平的政府责任及政策理性 贾 康
Realize Fair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Policy Rationality
By Jia Kang

- 133 最大的公平是发展生产力 姜 波
The Most Fairness is to Develop Productive Forces
By Jiang Bo

- 147 “权力型”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赵 晓 董 栋
Disparity Analysis of “Right-based” Income Distribution
By Zhao Xiao Dong Dong

调研报告

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

- 163 新农村建设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韩 俊
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and Guiding Farmers to Re-
side together
By Han Jun

- 178 云南农垦模式调查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课题组
Research of Yunnan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Pattern
By Research Team

稿 约

中国经济观察

2006 年卷 第 4 辑

热点聚焦

Hot Spots in Focus

中国人口政策 不可轻变

王东京

讨论人口问题，老生常谈。所以作此文，是现在有人担心将来社会老龄化，主张放松人口政策。老龄化当然要重视，但能否放开生育控制，则是两码事。本文重点讨论三个问题：（1）中国继续控制人口的理由；（2）控制人口与应对老龄化的思路；（3）养老保险空账的化解办法。

一、考虑到资源约束：中国 必须继续控制人口

长久以来，民间有种说法：人少好吃饭，人多好干活。这样看，人多的确未必就是坏事。是的，人不仅要吃饭，而且能干活，正是这种吃饭和干活的矛盾，才使人口问题复杂起来。

大体上说，古代社会，地广人稀，缺人干活是主要矛盾。只要有人，就可以开荒种地、打猎捕鱼，人口就是财富。威廉·配第讲：“劳动是财富之父”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时期，人口增长是好

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、教授。

事，是兴邦之道。所以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，卧薪尝胆时也没忘颁布法令：“女子十七不嫁，父母有罪；男子二十不娶，父母有罪。”齐桓公更绝，甚至把宫中女侍都嫁出去，可谓用心良苦。为的就是多生孩子，多添人口，以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，进而称霸诸侯。

反对人口增长的声音也是有的，马尔萨斯不是第一个，但却是最著名的一个。说到底，他关注的是吃饭问题。到他那个时代，人口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，在局部地区，比如当时的西欧，人口密度已经很大了。马尔萨斯对此忧心忡忡，他不知道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还要持续多久，但很明显，经济的停滞是看得见的。于是他预言，这是一场龟兔赛跑，人口增长像兔子般的飞奔，而粮食增长只能如乌龟一样一步步爬行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，人们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在悲惨和屈辱中聊度残生。

这是个大胆的预言，两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。仅此一点就可断定，这位牧师绝非平庸之辈。但智慧超群不等于机会凑巧，马尔萨斯的不幸之处就在于，他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，竟没有发现工业革命的到来。机器的轰鸣声很快淹没了他的预言，现代经济增长，极大地拓展了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。西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，而美洲，则呼唤人们去开拓新的疆土。历史站在了亚当·斯密一边，因为他断言了国民的“富裕”，马尔萨斯，则不合时宜地预言了人类的贫困。

从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喜大悲的时期。成就和灾难都是空前的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提高了，但增长的进程并没有持续下去。两次世界大战，以及30年代的全球性大危机，都把它给打断了。真正的挑战出现在二战之后。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，不仅提高了出生率，而且显著地降低了死亡率，人口增长速度史无前例地达到了2%甚至3%。短短40多年的功夫，全球人口就翻了一番；从1945年的25亿，飙升为1987年的50亿，现在则早已突破了60亿。整个世界都一片惊呼，难道马尔萨斯的幽灵又回来了吗？

世界的惊呼正是中国的问题。建国之初，还是“4万万同胞”，可自从批倒了马寅初，控制人口这事，再也没人敢提了，由着它翻着跟头地往上涨。农村妇女，生五六个孩子很平常，要是生到十几个，

村里人都得高看一眼。小孩子刚六七岁，还没到上学年龄，就得照看一大堆弟弟妹妹，背着一个，领着一群。现在来说，这是很可笑、很尴尬的事，可在当时，却很普遍。按照那时的逻辑，每个人都有一张嘴，两只手；一张嘴吃饭，两只手干活，以一对二，是很划算的。因此人口是财富，而不是负担。

若倒退 500 年，这个逻辑是对的，可今天是大错而特错了，错就错在没有考虑资源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张嘴和两只手的对比，而是“爆炸”的人口同有限资源的对比。说到底，这还是个马尔萨斯问题，只不过他对比的是人口和粮食，这里讲的是人口和资源。有人做过统计，1900 年，全球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不过千桶，钢材不过 2000 吨，而现在分别是 7800 万桶和 500 多万吨。自然资源是有限的，有些不可再生，按这个速度消耗下去，可怎么得了。而且社会越发展，文明越演进，人均资源消耗量越大。若人口无度增长，跟资源的匹配严重失衡，将来的社会无法安宁。

考虑到资源约束，“人多好干活”也值得商榷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你让他干活，先得把他装备起来。演京剧的得有行头，炼钢的得有高炉，即使摆个摊子理发，至少得有把剪刀。印第安人可以凭着两条腿在草原上追逐猎物，可现代人不行；我们没有这个脚力，更没有靠蛛丝马迹来识别猎物的能力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确实退化了，类似的技能，也快要失传了。这绝不是说现代人无能，我们有更多自由的空间，做成许多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但必须借助于各种复杂的装备。如果啥都没有，空攥着两只拳头，人多也干不了活，只能白吃饭。由此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有限的国民产出，既得吃饭，还得搞“装备”，如果不控制人口，怎么顾得过来。

将来技术发展了，或许能开发出新的能源，用太阳来发电，利用光合作用在工厂里生产粮食。甚至再找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，把人们迁到那上面去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也许就不再依赖现有的资源了，生存的空间也大大扩展了，人口是不是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了呢？这个问题不简单，反正我是说不清楚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，我们不可能把脖子绑起来，不吃

饭，干等着呀。

说得现实一点，能供养多少人口是一回事，要不要那么多的人口是另一回事。与马尔萨斯时代相比，今天的技术不知要发达多少倍，物质条件也好得多，按那时的生活水平算账，可能 160 亿人都能养活。可时代变了，人们的观念也变了，今天的社会，要对提高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负责，所以 60 亿人都嫌多了。我们理应对技术充满信心，相信它能创造奇迹。但人们更希望奇迹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而不是在现有的水平上增加更多的人口。

中国控制人口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，30 年来，少生了 3 亿多人。但这还不够，要保证经济的成功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推进社会的进步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，还得坚持下去，至少当下还不能轻言改变，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。

二、考虑到标本兼治：控制人口要有新思路

据我所知，目前在基层抓计生的官员，大都一肚子苦水。特别在农村，计生工作的难处，通常不为外人所道。矛盾在于，不采取点手段，硬邦邦的指标完不成，到上面交不了差；可手段用过了，老百姓不答应，保不齐还得挨处分。这些年，他们是跑细了腿，磨破了嘴，干过出格的事，也挨过人家的骂，甚至有人说他们“断子绝孙”。费力不讨好，计生干部的确是有苦难言。

农村计生工作为何难？有人说是因为农民愚昧，封建意识作怪。这话不能说不不对，但还没说到根上。唯物得彻底一点，观念问题是个利益问题。农民最讲实惠，他们愿意多生孩子，是因为生多了有好处。用经济学的話說，叫收益大于成本。在中国广大的农村，谁家人口多，谁家势力就大。家族之间的纠纷，靠的首先不是法律，而是拳头。对这种解决问题的做法，你可以嗤之以鼻，但不能不承认，在一个靠体力、或是人多势众的环境中，多生孩子是合乎理性的。

自古说，多子多福。意思是子女越多，晚年越有保障。最起码，

几个子女养一对老人，负担要小些，对两代人都有利。这是说的收益。而另一方面，农村养孩子的成本又很低，吃不起鱼、肉，可以吃地瓜，上不起学可以下地干活，外出打工还能补贴家用。这样一来，低成本、高收益，怎会不超生？你说农民愚昧，其实他们账算得精明；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演算了好几千年，不会错到哪里去。如果硬说是观念问题，那是因为上面的逻辑已经渗透在农民的骨子里，融化在农村的传统里了。

现代生育理论非常复杂，从经济上算账不是全部原因，但至少是因素之一。问题就在于，我们的计生工作，对这一点分析得不多，重视得不够，所以工作越来越难做。宣传教育不可没有，但也不能期望过高。对大多数农民来说，什么资源紧张，什么可持续发展，都是大道理，不着边际，很难为之所动。光靠蛮力也不行，干群关系会越来越紧张，积累起来，都是不安定因素。回顾历史，经济利益才是最能深刻改变社会的力量，不管是谁，想跟它打持久战，往往要以失败告终。

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计划生育既然要长期坚持，就得想个治本之策。我们的工作思路，是不是也要来一个转变，更多地从成本和收益方面想办法。超生罚款很多地方都用过，但效果不算理想；主要是因为并不能有效地增加生育成本。乍看起来，罚款数额好像挺大，可平摊在孩子的一生中，实际上没多少钱。

20多年前，南方有位民办教师，由于超生，被罚了3000元；当时觉得是个天文数字，他干脆给儿子取名叫周千三。现在周千三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他爸还觉得挺划算。再有就是罚款的口子一开，花钱买生育指标就合法化了。除了给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之外，对控制人口作用并不大。那么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很多人都出过主意，土的洋的都有，但大部分都是法律或道德不能接受的。

不是说，可接受的办法真的没有，眼下就有两计可施：一是健全社保体系，特别是社会养老，只要老有所养，就会减少对子女的依赖，降低养孩子的收益。这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，养老体制虽已启动，但主要集中在城镇，没有覆盖到农村。另一个是从严执行义务教

育法，不管是谁，剥夺了孩子上学的权利，就被视作犯罪。这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，还能增加养孩子的成本。这个办法，好就好在跟敏感的人权问题隔离开了。生育自由在国际上是受保护的，因此计划生育常常受到指责。但以侵犯未成年人的权益论罪，从哪个方面都能讲得过去，即使拿到国际会议上，也能摆在桌面上来。

除了人口总量，还有结构。人口结构，关系到人口素质。比如现在的农村，一对夫妇生 1.5 个孩子，而城市只生 1 个。假设有 3 对夫妇，2 对在农村，1 对在城市，接受城市文明的占总人口的 $\frac{1}{3}$ ；可到了下一代，就成了 $\frac{1}{4}$ 。这样，人口素质必会降低。当然，这是静态分析，没有考虑城市化和农村孩子考大学进城。但总的说，农家子弟成才更难，机会更少；这不是他们天生就笨，而是环境使然。我本人生长在农村，绝无歧视农民的意思。金融学有条定律，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我们现行的生育状况，会不会也导致类似的结果呢？

再说老龄化问题。计划生育减少了新生儿，将来的结果必然是老年人多，年轻人少。以前是一对夫妇养五六个孩子，两代人之比小于 1，而实行了计划生育，这个比例就大于 1 了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老龄化。西方国家，由于较早就出现了低生育率，现在正在被这个问题困扰，我们迟早也会遇到的。老年人丧失了工作能力，还得生活、就医，用什么来养活他们？你可以说由社会养老，可社会也得拿出东西来不是？

应对老龄化，归根到底，还得靠科技创新，提高劳动生产率。干活的人少了，吃饭的人相对增多，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将来僧多粥少的矛盾就化解不了。因此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，发展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，是个长久之策，切不可大意。劳动力成本低，只是眼前优势，再过 10 多年，随着劳动力人数急剧减少，我们这方面的优势，将可能荡然无存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人口问题非比寻常，它的特点是有滞后性。有问题当时表现不出来，即使预见到，也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解决。可 10 多年后，问题一旦凸现，摆在人们面前，就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去矫正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，希望政府多一些未雨绸缪的

做法，少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。

三、考虑到老龄化来临：养老金 空账必须火速填补

老龄化问题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们迟早要面对，然而当务之急，则是如何解决好现在老人的养老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好，待日后老龄化一旦到来，就会旧病新愁、积重难返。这些年，我们的社保改革总体说步子很大，但困难也不少，至于难在哪里？说来说去，核心问题还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
养老保险也好，医疗保险也罢，都得有钱，没有钱，保障无疑画饼充饥。从一定程度讲，这正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的社保是近10年才建起来的，一些老职工以前没有入保险，他们的账户里并没有钱，可现在人老了，身体也差了，到了用钱的时候，可养老金、医疗费却没着落。如此一来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就好像八个人凑钱订了一桌饭，本是按各人胃口掐算好的，现在八个人还没落座，突然又来两位不速之客，这顿饭怎么吃？

现在社保基金收不抵支、捉襟见肘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按理讲，你没凑份子，就不该来吃饭，没入保险，就不该领保险金，这似乎天经地义、毋庸置疑。可如果据此指责我们的老职工，既不通情理，也不公平。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，而是个历史问题。

人所皆知，以前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，说是工资，其实只是基本生活费，其余大部分都被国家收走了，用于上项目、铺摊子。当时政府讲：把钱交给政府，将来政府来负责大家吃饭养老。建国后的几十年，也一直是这样做的，因此职工对此深信不疑，拿低工资也无怨无悔。可料想不到的是，等到这批职工退休，国家却改了章程，政府不再管饭，让他们去找社保机构。换个地方吃饭，倒也不是什么问题，问题是政府没给饭钱。于是，他们便成了不速之客，搞得大家都尴尬。

政府现在的办法，说白了，还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八个人订饭，